

#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人民空军建设

时 刚 王 伟

摘 要: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初创时期和关键阶段,各项建设突飞猛进,部队在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并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本文从调整扩充编制体制、加速发展武器装备、大力推进实战训练、不断强化政治工作、着力提升地面保障能力五个方面,对这一时期人民空军建设情况进行了考察,以期廓清史实、梳理经验,为人民空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 抗美援朝战争 人民空军 编制体制 武器装备 训练 政治工作 保障

中图分类号: E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451(2013)02-0026-07

作 者: 时刚,南京政治学院部队政工系主任,副教授(上海 200433)

王伟,河南省滑县人民武装部参谋(河南滑县 456400)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人民空军作为一支年轻的力量,在飞机紧缺、人员较少、战术技能不成熟的条件下,主动作为,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从打小仗到打大仗,从只能在昼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到能够在昼间比较复杂的气象条件下和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sup>[1]84</sup>并不失时机地组织大批新建部队轮番担负作战任务,实现了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的预期目的,取得了骄人战绩,为空军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一、调整扩充编制体制

### (一) 组建航校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航空兵部队的迅速扩充,对空、地勤人员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我军原有航校的培训规模已很难满足部队发展的需要,从1951年开始,在原有7所航校的基础上,先后两次扩建新的航校,至1953年年底空军共有航校13所,另加一个空军指挥员训练班。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航校共计为部队培养飞行人员5945名(其中女飞行学员55名),机务人员2.4万名,军事干部396名,政治干部690名,后勤干部310名,<sup>[1]42</sup>保证了航空兵部队对人才的需要。1950年到1953年间,先后成立了8个航空预科总队(后改称航空预备学校),对准备入航空学校学习的学员集中进行预科教育,并相继成立了机务学校、干部学校(1952年9月改称空军政治干部学校),人民空军逐步建立起多种类型、综合性院校培训体系。<sup>[2]113</sup>

### (二) 组建航空兵部队

人民空军为适应参战的需要,遵照军委关于抓住友军空军部队协助我防空的机会、帮助我进行训练和作战的指示,决心以最大的努力、尽最大的可能,采取一切最迅速最有效的措施,组成与训练出一批空军部队,使之能早日参战。

1950年8月,周恩来在主持召开检查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情况的国防会议上决定:空军在已有第一批7个航空兵团的基础上,增编3个轰炸机团和1个海军飞机团,1951年下半年再增大编

制。<sup>[3]190</sup>1950年10月1日到11月25日,空军先后以从陆军调来的机构和干部为基础,组建了空军第二批航空部队共两个旅,即:空军驱逐第3旅,下辖第7、8、9共3个团;空军驱逐第2旅,下辖第11和第14团,原第4混成旅所辖的第12、13团暂归该旅建制。除上述2个旅以外,10月22日军委决定第4混成旅旅部率第14团自上海出发,去东北与驱逐第3旅的第7团合编为驱逐第4旅。<sup>①</sup>

为进一步加速空军部队的建设,1950年11月空军首长两次建议并经军委批准,以陆军调来的机构和干部为基础组建第三批航空部队共5个师,即:第5师(冲击师),第6师(驱逐师),第7师(驱逐师),第8师(轰炸师),第9师(驱逐师)。<sup>②</sup>这5个师自1950年11月20日至12月27日的37天时间里先后组建,并分别接收了1、2、3、4、7航校毕业的飞行学员,迅速投入飞行训练。1950年12月下旬至1951年5月下旬,组建了空军第四批航空部队共8个师,即:空军第10师(轰炸师),第11师(冲击师),第12师(驱逐师),第14师(驱逐师),第15师(驱逐师),第16师(驱逐师),第17师(驱逐师),第18师(驱逐师)。<sup>③</sup>截至1951年5月,连同空军第13师(运输机),共编组了17个航空兵师(含第二批、第三批组建的3个旅),34个航空兵团。<sup>④</sup>

到1953年底,空军“边打边训边建”,在苏联的援助下已建成一支拥有28个航空兵师5个独立团的空中力量。<sup>[4]23</sup>

### (三) 组建空降兵部队

1950年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建空军空降兵部队。由于空降兵部队作战的特殊性,在选拔人员的时候,各军区、野战军抽调的人员几乎全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模范班排干部以及一、二等功臣;而空降兵领导机构的人选则全是从有指挥作战经验的步兵师团营领导干部中选调,同年7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确定部队的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1旅。<sup>[5]237</sup>

第一支空降兵部队在编制上参照了苏联经验,并结合我军实际情况,确立了旅机关设司令部、供给处、技术处、医务处等机构;作战和保障分队,设狙击第1、2、3、4营,1个迫击炮营,1个战防炮营,1个坦克营,以及通信、侦察、高射机枪、工兵、运输、卫生等直属连队,全旅共编3884人。<sup>[6]51</sup>在基地选择上,经过对开封、新乡、安阳三地的实地考察,最终确立开封为训练基地。在旅机关组建后,立即开展了部队的组建工作,先后接收了从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和东北、华北、山东军区中的37个军和3个军级单位抽调来的6862人,经过体检淘汰1809人,最终编制5000余人。1950年9月17日,空军陆战第1旅正式成立,<sup>[3]151</sup>这批军政素质高,作风纪律优秀的战斗功臣成为空降兵建设的中坚力量。

## 二、加速发展武器装备

### (一) 建立航空工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因此人民空军的武器装备只能靠进口。朝鲜战争爆发后,航空工业的建立再次被提上日程。1950年12月,周恩来多次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中国航空工业问题。<sup>[7]31</sup>中共中央派出由何长工等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援建中国航空工业的问题。经过艰苦谈判,中苏双方于1951年2月19日就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原则、规模及工厂选址等问题达成了协议。<sup>[8]343</sup>

①空军司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抗美援朝大事记》,1965年,第6页。

②空军司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抗美援朝大事记》,1965年,第7页。

③空军司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抗美援朝大事记》,1965年,第7页。

④空军司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抗美援朝大事记》,1965年,第8页。

为加强对航空工业的领导,中央军委成立了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下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5月初,以大连建新公司为基础,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机关在沈阳组建;5月15日,航空工业管理局正式成立。<sup>[8]343</sup>至9月14日,空军16个工厂全部按计划移交该局。<sup>①</sup>该年下半年起,航空工业局将接收的工厂有计划地陆续调整为11个工厂,并将其中80%的人员与70%以上的设备,集中到哈尔滨120、122厂,株洲331厂,南昌320厂等6个主要工厂,<sup>[9]16</sup>航空工业各项建设快速发展。到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末期,6个主要工厂都已具有了新型大修理厂的规模,<sup>[9]18</sup>不仅为全面开展航空产品修理工作创造了条件,而且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大规模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加速了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到战争结束时航空工业已完成了由修理到制造的过渡,<sup>[10]21</sup>为武器装备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 (二) 提高战机数量和质量

为了解决空军的武器装备问题,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的建设由原来重点加强海军、空军建设改为重点加强空军、炮兵(含高射炮兵)和装甲兵的建设。1950年2月中旬,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贸易协定,在苏联向中国提供的3亿美元贷款中,原计划以1.5亿美元购买海军装备,此时决定将这笔贷款大部分转为用于购买空军飞机和陆军武器装备,以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sup>[3]186</sup>1951年2月,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表示人民空军将以10个航空兵团(4个米格-15歼击机航空兵团、1个拉-11歼击机航空兵团、3个图-2轰炸机航空兵团、2个伊尔-10强击机航空兵团)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中国还需订购飞机、弹药、专用汽车、通信器材、油料等配套物资,并要求苏联于4月1日前将上述装备和物资运抵中国。<sup>[11]17</sup>斯大林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先后致电毛泽东表示,以前卖给中国的米格-9飞机性能不敌美国的喷气式飞机,愿意向中方无偿提供372架米格-15战机(只收取运输费),用以改装中国的6个米格-9歼击机师,其中第一批72架于6月20日前运抵中国,剩下的300架也于8月底前运抵中国。<sup>[3]186</sup>

鉴于在朝鲜战场上我志愿军飞机大炮数量有限的情况,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sup>[12]47</sup>全国各地、各族人民及机关团体、驻外机构和华侨华人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捐献。据统计,自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31日,一年来所捐献的钱款折合人民币55650亿元,以每架飞机15亿元计算,共折合3710架飞机,尚余6230万元。<sup>[12]51</sup>

在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空军组建了21个航空兵师,其中16个歼击机师、2个强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1个运输机师,当时勉强可以出动作战的4个歼击机师中有3个半师装备的是性能比较落后的米格-9和拉-11战斗机,这两种飞机根本无法和美军的喷气式飞机匹敌,从6月份开始,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志愿军空军逐渐将这些落后的装备改装为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15战斗机,至9月份共有8个米格-15歼击机师。<sup>[12]30</sup>从1952年10月份开始,志愿军空军又开始改装性能更加优良的米格-15比斯歼击机。<sup>[12]288</sup>通过改装这些性能优良的战机,大大提高了志愿军空军的战斗力,为空军作战提供了重要保障。

<sup>①</sup>共计移交16个工厂的机器设备(包括大小各型车床)2269部;建筑面积44.7万平方米;人员5453名(内有排以上参照军队供给制干部436名,班以下参照军队供给制人员1420人,薪金制工人3597人),资金(包括设备、房屋等)折合人民币4810万元。与此同时,根据重工业部的决定,航空工业局又分别接收了重工业部兵工总局的两个工厂(国营第282厂,东北兵工局21厂)。

### 三、大力推进实战训练

#### (一) 探索作战原则

志愿军空军在参战之初,没有成熟的空战战术原则,主要是根据人民解放军陆军以往的作战经验,提出“大胆细心”、“周密准备”、“以多胜少”、“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机动灵活”等一般性的作战原则和要求。这些战术原则在参战之初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随着空战规模的扩大和美军航空兵战术的改变,志愿军空军在集中兵力、编队协同、空地指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迫切需要有一套适合战场情况的作战方法。<sup>[10]22</sup>在这个时候,空军领导提出了“在实践中提高,在战斗中成长”的口号,号召广大参战飞行员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创造适合于自己的战法战胜敌人。

空战中,飞行员们加强了战术手段及作战方法的研究和运用,经过多次战斗实践,大家普遍认识到,在发挥编队协同作战的基础上,还必须详细解决攻击方法和战术手段问题。为此,各部队在飞行结束后,举行形式多样的讲评会,找出空中指挥、编队战术和射击动作上存在的问题,总结出经验教训,以争取更大的胜利。特别是“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指导原则提出后,更激发了大家学习战术研究战术的热情,逐步摸索出了编队作战、保持双机、争取四机、讲战术、有指挥的作战经验,从而保证了空战的胜利。<sup>[5]282</sup>从1952年1月开始,我志愿军空军即开始由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带领新部队作战,先后参战的9个师,均取得了作战经验,开始独立担负空中作战任务。<sup>[12]289</sup>

#### (二) 创新战法

创新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空军同样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创新战法,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战法。典型的如“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原则,这一战术原则用以指导志愿军空军空战战术,在此基础上志愿军空军还发明了很多新的空战战术,或者是对过去战术的改进,或者是新发明,或者是学习借鉴。这些空战战术包括诱饵战术、阶梯战术、钳形包围战术,其中有些战术是学习陆军的,比如诱饵战术。<sup>①</sup>

创新的首要前提是要学习和了解相应的规律。早期我军从苏军那里学的是一字阵形,具体说就是一个团的飞机,二十几架排成一字横队,这是二战期间用得比较多的战法。美军也总结了这一战法,并应用到战斗中去。针对这种情况,志愿军空军大胆创新,总结出了“两翼夹击”的战法,即当敌机排成一字横队时,我方从美机群中间穿过去,将美机群一分为二,然后中间几架飞机向前飞,让美军的飞机跟着我们中间的飞机往前飞,接着我机分开左右两个阵形,一起对敌机进行合围。再比如志愿军空军根据美军指尖阵形的四机编队总结出了蛇形队形编队。就是每一层都是四架飞机,这四架飞机组成一个机群,四架飞机不在一个高度,越往后越高,而后面每一层的小机群像蛇一样呈“S”形排开,这中间前后左右上下都有距离差。这样的编队队形,从战术使用上比较灵活,能够起到互相掩护的作用。一旦有四机受到攻击,其他的飞机很快能赶上来对敌目标实施攻击。<sup>②</sup>

除了学习对手创新战法外,志愿军空军也根据自身飞机的特点及陆战战术原则积极创新战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如最著名的战术动作“向上综合机动、向下综合机动”就是由我志愿军空军发明的。众所周知,在空战中从后面打是最安全最容易的打法,而从侧面打就比较困难。采用“向上综合机动、向下综合机动”的战术动作可以实现对敌机的咬尾,实现战略优势,然后实施攻击。志愿军空军王牌飞行员赵宝桐在空战中结合陆军战法发明了“横扫敌机”的战法。一般在空战中咬

①根据空军主办的《空军课堂》2009年第4期整理。

②根据空军主办的《空军课堂》2009年第4期整理。

到敌机后,用光环套上,然后射击,这称为“点攻击”,这种攻击方式的命中概率相对较低。赵宝桐在空战中发现,如果能够像地面上的机枪一样横扫,命中概率就大大提高了。基于这种想法,他在瞄准敌机以后扫射,然后压低操纵杆,将点射变成横扫,结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取得了击落敌7架喷气式飞机的辉煌战果。

### (三) 轮战锻炼

1951年10月毛泽东指示刘亚楼,要争取时间锻炼部队,应设法使更多的部队参加实战锻炼。为此,空军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认为毛主席关于争取时间锻炼部队的指示对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要以最大的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机,争取时间,将所有可能参战的部队投入作战,得到实战锻炼。<sup>①</sup>

为此,空军根据作战计划,从1951年8月至1952年6月共安排了四批次部队参加了实战锻炼。战场是最好的练兵场,通过轮番作战,各参战部队能够在一般气象条件下遂行作战任务,创造和发展了歼击航空兵战术,技战术均取得了较大进步,部队的作战水平得到了提高。在战斗指挥方面,重点解决了指挥员率领机群有组织地作战问题,特别是纠正了部分指挥员只顾个人攻击敌机,而不顾指挥编队作战的毛病;在编队作战上,提高了飞行员双机协同作战的意识,克服了单机蛮干的缺陷;在装备维护上,不断改进装备,提高装备作战性能,保证了飞机的出动。

1952年6月,空军党委决定军区空军的指挥机构要进行轮战锻炼,借以提高指挥能力。同时确定航校和没有参战部队的主要领导及部分战勤人员,也要分批到安东进行战地实习。截至1953年7月,到志愿军空军指挥机关和参战部队见学实习的空军人员共有1727名。<sup>[13]70-71</sup>

## 四、不断强化政治工作

### (一) 强化战斗精神培育

克服畏敌情绪,消除思想障碍。志愿军空军在刚组建的时候,由于我们面对的是强大的联合国军特别是美军,他们的飞行员大都参加过二战,飞行时间都在2000小时以上,而我们的空军刚组建不到一年,飞机老旧,飞行时间大都是几十小时,作战经验为零,因此不少人产生了畏敌情绪。面对这种情况,空军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在战斗中成长”的思想,通过强化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要求官兵继承陆军的光荣传统,不断摸索,“研究敌人,摸到脾气”,“以我之长,击敌之短”,达到逐步消灭敌人的目的。<sup>②</sup>通过及时有效的思想教育,参战人员增强了信心。

结合重要战例,激励战斗意志。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志愿军空军利用既有装备,与敌机斗智斗勇进行了殊死搏斗,取得了辉煌战绩,其中许多战例堪称经典。我志愿军空军各级党组织抓住时机,结合这些经典战例,教育部队,同时号召大家向英雄学习,在战场上立功。

开展立功运动,提升战斗热情。为提升广大指战员及地勤人员的战斗热情,志愿军空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立功运动。随着作战的不断深入,细化完善了立功标准,涉及飞行员、地勤人员、后勤人员等各个方面。飞行员的立功标准,不仅有打敌机数目的标准,还有掩护和援助别人的英雄行动的标准,提出“援助战友比打下飞机更光荣”的口号,<sup>③</sup>不仅提升了广大参战官兵的战斗热情,更发扬了作战飞机之间相互协作的精神,极大地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①空军司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抗美援朝大事记》,1965年,第108页。

②空军司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抗美援朝大事记》,1965年,第3页。

③空军司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抗美援朝大事记》,1965年,第30-31页。

## (二) 加强官兵思想引导

消除两种倾向,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在作战过程中,部队思想易于发生左右摇摆,在连打几个胜仗取得一定成绩、战术技术均有提高时,易于滋生骄傲、松懈的思想,往往只有攻击,而无防御。而遭到某些失利时,则易产生恐惧、消极避战和互相埋怨的情绪。针对这两种倾向,空军各级党组织审时度势,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向广大官兵反复说明朝鲜战场就是一个练兵场,不战就不能得到锻炼和提高,“主力”是打出来的,“英雄”是在战斗中产生的。而麻痹大意,消极应敌只能处处挨打。通过正确的思想引导,及时消除了这两种不良倾向,保证了后续战争的胜利。

加强地勤人员思想引导。战时地面勤务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空战能否胜利,因此加强地面勤务人员的思想教育极为重要。空军加强了党支部对机务、供应各业务部门工作的领导,并反复教育告诫官兵,如果机务、供应工作不到位,一架飞机不能按时起飞,就会失去双机甚至四机的战斗力;一架空中指挥员的飞机不能按时起飞,更会影响到空中带队指挥,只有“地面精修”,飞行员才能“空中精飞”。

强化官兵持续作战思想引导。朝鲜战场战斗频繁,每天几乎都会有飞机出动,有时候每天出动两次到三次。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官兵产生厌战情绪和麻痹大意思想,特别是后来实行部队轮番作战后,这种思想倾向有所抬头;在作战时间较长的部队中,又易于产生“换班”和“歇一歇”的思想。针对这种情况,各级部队进行了持久作战的教育,教育广大参战人员“只要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就一天也不能松懈”,要发扬陆军在长期的战争中形成的“连续作战”的精神,自觉地同麻痹大意思想作斗争,消除各种不良倾向,稳定了军心士气。

## (三) 严格战斗纪律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部分官兵认为空军是技术兵种,只要学习掌握好技术就行,不需要强调纪律。针对这种情况,志愿军空军制定了严格的战斗纪律,各级党委领导积极贯彻上级领导指示,对于作战训练中的违章违规操作的行为,给予了严厉批评,作出严肃处理。1951年2月13日,空军第五航空学校组织飞行训练,飞行教员刘登起严重违反纪律,驾驶飞机向某地集市俯冲以炫耀自己,结果撞山,造成机毁人亡,给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并在社会上造成很坏影响。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严厉批评说“应把这种坏作风看作‘空中流氓’行为。”<sup>[4]369</sup>按照他的指示,《人民空军》杂志第20期以《“空中流氓”刘登起丧了命》的醒目标题报道了这起事件,并且刊登了该航校党委《关于刘登起等飞行失事检讨的报告》,号召在飞行员队伍中广泛开展批判“空中流氓”的思想斗争。空军还先后开展了对赵砚田失事肇祸,谢登宇、焦延寿用飞机扫雪等违法乱纪事件的批判斗争,空军党委也几次作出关于纠正飞行干部违法乱纪的决定,<sup>[15]23</sup>进一步严明了军队纪律。

## 五、着力提升地面保障能力

### (一) 不断提高机务维护水平

战争初期,我军使用的是初次参战的米格-15飞机,虽然作战性能优良,但可靠性比较差,维修复杂,尤其是定期检修工作特别频繁,工作量非常大,使机务保障工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为了保证飞机的作战性能处于良好状态,1951年9月,空军党委号召全体地勤人员“一切为了战斗胜利”,提出了“胜利的表现天空,胜利的保证在地面”的口号。号召切实做到故障不过夜,故障不上天。空军机务保障人员本着“在实践中提高,在战斗中成长”的精神,刻苦钻研专业技术,认真学习维修技能,保证了战鹰能够随时起飞战斗。当时的机务保障人员除了少数由陆军转入外,大部分是刚刚走出校门不满20岁的青年学生,从事飞机维修也只有几个月。为解决日常维修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机务保障人员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故障研究活动。只要平时有时间,就聚在一起结合研究故障,群策群力攻坚克难。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逐步总结摸索出了在边组织、边扩大、边

学习、边工作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路子,即:首先掌握维护时间和制定主要的工作条例,然后再注意提高理论,逐步进行全面的业务建设。<sup>[16]80</sup>在总结摸索中,借鉴苏联空军的各项维修条例及法规,我军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外场工作制度,制定并颁布了维护条例。在保证飞行安全、消灭事故方面,确定了飞行阶段机务工作的内容和方法,采取换季检查等措施,提出了飞机保持 85% 良好率的要求,规定梯次使用飞机以及发动机空地使用时间比例标准等。<sup>[16]81</sup>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机务保障人员共修理飞机 800 多架,修理附件 20 余万件,保证了战鹰飞行 6 万多小时,10 多万架次,战斗出勤率达 99% 以上,<sup>[16]80</sup>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 (二) 稳步提升后勤保障能力

这个时期的后勤工作,经历了一个由陆军后勤向空军后勤的转变。空军后勤保障工作,对于这些从陆军过来的指战员来说,十分陌生。在转变过程中,边组建机构,边担负任务,边学习空军后勤业务知识,成为空军初创时期后勤工作的主要特点。

早在 1950 年 12 月,空军领导就开始着手空军入朝参战前的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并派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杨尚儒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先期入朝。1951 年 3 月,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作出指示:积极抓紧做好志愿军空军部队入朝参战的各项准备工作,组织抢修机场和仓库;准备供空地勤人员居住的山洞;组织接收、保管好从国内运进朝鲜的作战物资,主要是航空油料、弹药、器材、空地勤人员的被装、粮食等。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先后从中南军区空军、华东军区空军、东北军区空军和空军后勤部机关抽调干部,组成了志愿军空军后勤部,下设 4 处 1 室,即参谋处、供给处、场建处、卫生处和政委办公室。后来又组建了轰炸和冲击两个指挥部。在朝期间,后勤保障人员先后完成了抢修作战机场、抢运作战物资、抢救跳伞飞行人员及为准备入朝空军地勤人员筹备住处等工作。共计改扩建机场 28 处,负责保障的航油油罐达 700 多个,累计收容跳伞人员 142 人,完成对 12 个轮训航空兵师的后勤保障任务,圆满地完成了祖国人民赋予的任务。<sup>[5]367</sup>虽然后期空军未能进驻朝鲜机场,但在美军频繁轰炸的情况下,后勤人员进行了各项战时准备工作,积累总结了野战条件下的后勤保障经验,为以后更加有效地组织开展空军后勤保障工作打下了基础。

## 参考文献:

- [1] 空军司令部编研室. 空军史[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 [2] 中国空军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 中国空军百科全书(空军历史分册·上)[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3.
- [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1.
- [4] 蒋建雄. 从中国空军的产生和在两场战争中的作用看空军的发展建设[J]. 军事历史, 1999(6).
-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空军回忆史料[G].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2.
- [6] 刘立振. 新中国第一支空降兵部队的诞生[J]. 党史博览, 2007(10).
- [7] 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四卷)[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1.
- [9] 孟广荣, 孙广运. 新中国航空工业史稿(1951-1965)[G]. 航空工业部档案馆, 1982.
- [10] 严鸿. 抗美援朝战争对人民空军建设的推动[J]. 军事历史, 2010(5).
- [11] 沈志华, 李丹慧. 1950 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 [1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抗美援朝战争史(下卷)[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1.
- [13] 加打一番[J]. 航空档案, 2010(2).
- [14] 杨万春, 齐春元. 刘亚楼将军传[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 [15] 刘瑾. 刘亚楼人民空军空军建设思想研究[D]. 南京: 南京政治学院, 2011.
- [16] 张善明, 付江涛等. 空军政治工作发展史[M]. 北京: 蓝天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 朱加荣)